

民国政要的

私密档案



郑会欣——著

还原历史 揭密内幕

走进民国时期的原始档案
发掘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中华书局

史迪威的去留为何引发 蒋介石对宋子文摔杯大骂？



1943年10月11日，宋子文从美国飞回重庆，但是他没想到蒋介石此时已经改变了主意，这个突如其来消息让宋子文大为恼火。10月11日，他在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即对此事表露出强烈的不满。宋指责蒋介石，说他费了多少功夫才能完成这一任务，你怎么能说变就变呢？这么做的的话怎么对得起美方的友人，又如何让他们以后对自己有信心？宋子文最后甚至说，像你这样朝令夕改，以后实在没法与你共事。蒋介石起初觉得是有些理亏，因此没有说什么话，但他是一个个性极强之人，见宋唠唠叨叨说个没完，最后竟敢公开批评他，蒋终于忍不住了，于是大发雷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大吵起来……



蒋介石与孔祥熙 的恩怨怨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从信任有加到暗中调查，从愤怒至极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矛盾心理。尽管蒋介石可能曾一度有大义灭亲的想法，但是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缠在一起，他也无能为力了……



宋子文蒋经国赴苏谈 判的内幕是什么？

1956年6月30日下午3时，宋子文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欢迎的礼节极为隆重，与欢迎英国首相邱吉尔的仪式相等，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莫斯科卫戍总司令、重要部门首长以及全体外交团都到机场迎接。随后宋子文、傅秉常、胡世泽便晋见斯大林，开始双方的第一次谈判，但这一次……

民国政要的 私密档案

郑会欣——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郑会欣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3

ISBN 978 - 7 - 101 - 09918 - 8

I. 民… II. 郑… III. 中国历史 - 史料 - 民国 IV.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666 号

书 名 民国政要的私密档案

著 者 郑会欣

责任编辑 聂丽娟 陈小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½ 字数 168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918 - 8

定 价 32.00 元



序

杨天石

最近几十年，我一直致力于民国史研究，自然，十分关注海内外相关学人的动态。例如，他们有何出版的新著，发现了什么新资料，提出了什么新观点，在哪些方面推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等等。其中，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会欣教授是我十分关注的学人之一。

我之所以十分关注会欣教授的研究，原因很多。其一是他重点研究民国时期的财政经济史。如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活动，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例如政治、军事、外交、文化诸种类型的活动都建筑于经济活动的基础之上，受制于经济和财政状况。不了解经济史、财政史，就无法深入地了解和研究人在其他领域的活动。无法了解一个集团、党

派、政权的生存、发展与兴衰。我自己在大学时期学的是中国文学，毕业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研究中国哲学，后来由于命运安排，踏上史学研究之途，可以说，“勾挂三方来闯荡”了。但是，我绝不敢踏入经济史、财政史领域，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著作和文章虽然写了不少，但是，却基本没有写过经济史、财政史的文章，无他，自知学养不足，“藏拙”而已。然而，研究民国史，不了解经济史、财政史又不行。例如，不了解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就无法理解他们何以未能长驱北上，“直捣黄龙”；不了解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江浙金融集团和广东、两湖等地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就无法深入理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清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至于其他一系列全局性的、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例如，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谓“三座大山”之一的“官僚资本主义”等等，恐怕更无从置喙，只能人云亦云了。会欣教授是研究民国时期财政经济史的专家，著有《改革与困扰——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尝试》、《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贸易研究》等书，他的这些著作都能匡我不逮，引我思考。

原因之二是会欣教授曾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七年，高度熟悉民国档案，善于发现并利用珍贵档案，解决疑难问题。历史研究是实证科学，需要从史实出发，靠史实立论。史实已逝，需要靠史料还原、重建。在众多的史料中，档案最为重

要。有些历史事件，当时就扑朔迷离，事后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要查找可靠的、有权威的档案资料加以论列。会欣教授由于熟悉档案，因此常能利用这一优势，解决民国史上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以1947年孔、宋家族套购外汇一案为例。当年7月29日，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南京《中央日报》刊载消息：声称财政、经济两部奉令查明：自1946年3月政府开放外汇市场到同年11月修正进出口条例，强化管制的八个半月，中孚实业公司共结外汇153,778,723美元，扬子建业公司共结汇180,691,069美元，中国建设银行结汇87,762美元，三者相加，共达3亿3千余万美元，占同一时期中央银行售出外汇3亿多美元的88%弱。这三家公司分别是宋子良、孔令侃、宋子文创办的，属于豪门资本。消息刊出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愤慨。但是，两天以后，《中央日报》却又刊登《孚中、扬子等公司结购外汇之实数》，说明前登消息，有“数处漏列小数点”。按照新公布的“实数”计算，三公司的结汇数字仅为330余万美元，原报道夸大了一百倍。但是，这一更正不能为人取信，被认为是官方的庇护、掩饰，社会的愤怒和声讨更烈。甚至在多年后，原报道人、《中央日报》记者陆铿仍坚持旧说，并称“漏列小数点”是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为化解危机而采取的高招。这样看来，孔宋豪门套购巨额外汇一案似乎已成铁案，无可怀疑了。然而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会欣教授从当时经营进口的商品机构、进口货品的种类、价格等方面分析，认为

《中央日报》最初报道的数字显然过于夸大，与事实“相差实在太远”。不仅如此，会欣教授更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找到当年财政部的《签呈》和经济部的《会呈》，证明原文确有“小数点”，《中央日报》在据以报道时确实将之漏掉了。这就为解决这一多年疑案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

这样的情况非仅一例。抗战时期，孔祥熙的美金公债舞弊案，我曾根据蒋介石日记、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傅斯年档案等多种资料，论证其事，并且仔细阐述了蒋介石查处此案的经过。拙文发表后，《历史研究》杂志转来了会欣教授的同一主题的文章，要我提出意见。我读后发觉会欣教授的文章由于有二档馆等处的资料支撑，因此比拙文更翔实、更丰富，便大力推荐此文。而收在本书中的《唐绍仪被刺的原因》和我的一篇旧文所述大体相同，甚至利用的主要档案也大体相同，但是，拜读后，我仍然感到，会欣教授的文章所引用的资料比我丰富，在若干方面的论述比我深入。

会欣教授本书，阐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唐绍仪、张嘉璈、章太炎、张自忠、王云五、戴笠，以及唐寿民、孔令侃等人的事迹，大都见人之所未见，述人之所未述。其根据，则或来自南京、台北等地所存民国档案，或来自蒋介石、王世杰、张嘉璈、陈克文、唐纵等人的私人日记或笔记，因而都征实、可信，既可供研究者采用，补充现有史著之不足，又可供历史爱好者知人论世，藉以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物。

我和会欣教授相识多年，多次在海内外的档案馆和学术会议上相见，得到过他的许多帮助。我所希望于会欣教授的是，沿着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在民国财政、经济史和民国人物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2013年12月8日，时在新自台北归来之后

目 录

序 / 杨天石

蒋介石与反腐肃贪 / 1

蒋介石查处美金公债舞弊案 / 10

蒋介石与雅尔塔协定 / 30

蒋介石日记中的香港受降 / 57

蒋介石与孔祥熙的恩恩怨怨 / 67

宋子文“以行为家” / 84

宋子文的人际关系 / 92

战时重庆官场异动 / 106

民国政要的秘密档案

宋子文的“认错书” / 135

宋子文与战后初期的财经政策 / 146

宋子文下台以后 / 165

宋子文与九龙城寨事件 / 177

民国股改往事 / 190

合作与分歧 / 201

“理财高手”孔令侃 / 219

《金山日报》倒孔，孔氏心腹灭火 / 228

家仆狐假虎威，孔少仗势欺人 / 234

小数点之谜 / 244

章太炎抵制外资侵东北矿权 / 268

张嘉璈被撤职的前前后后 / 272

唐绍仪被刺的原因 / 284

张自忠：以死明志，以身殉国 / 298

戴笠也做媒？ / 311

有关宋美龄访美的几封电报 / 317

唐寿民的落水与入狱 / 332

王云五据理索要房产 / 344

后记 / 349

蒋介石与反腐肃贪

以往由于意识形态的宣传和需要，海峡两岸对于蒋介石的评价截然相反，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历史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有关蒋介石日记和档案的开放，推动了民国史的研究，愈来愈多学者开始以各种不同的角度对蒋介石予以重新审视，并发表了众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而且两岸学者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这应该说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最近这几年我正在进行抗战以来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每一重大贪腐个案发生的背景、经过以及最终处理的结果予以综合分析和对比，从中寻找一些共性的特征。在这中间，自然会涉及到蒋介石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肃贪的。

应该说，蒋介石个人的生活（特别是中年以后）还是相当清廉，也是比较俭朴的。作为党国的最高领袖，为了政权的稳定，对于贪污和腐败的行为，蒋介石是极为憎恶的，这种言论在他的日记和讲话中可以说随处可见，而且他还经常对这类案件予以严厉的惩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亦曾努力惩治贪污，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1936年3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行政院通令铲除贪污：（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滥用公物，（四）虚靡公物，（五）伪造报销，（六）收官用，（七）浮报，（八）兼职兼薪或津贴，（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亦曾多次颁布惩办贪污的法令，1938年3月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第十六条即明文规定：“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同年6月27日，颁布《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3年7月1日，又在其基础上经立法院修订，公布《惩治贪污条例》，并列举了21种贪污的行为。与此同时，财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缔国家行局以资金投机套利、禁止国家行局人员投机牟利以及禁止官员直接经营商业。但是，贪污的风气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愈来愈盛，特别是自抗战中期以后，这种腐败已经日益具有系统化、体制性的特点，这也是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物资极度匮乏，而大后方人口却迅速增加，物价上涨。为此政府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所有出口物

资均以统购统销的方式运营，并全面管理外汇，而对事关国计民生的物资则实施专卖。这些举措在战时是必须的，但它却使得那些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愈来愈大，导致黑市盛行，通货膨胀，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乃至囤积、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同时，战争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虽然抗战初期人心振奋，同仇敌忾，然而到了相持阶段，一是溃败的阴影，二是相对的偏安，人们的心态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那些官员和商人中，悲观厌战、得过且过、及时行乐的心态日益严重，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对此就有生动的描述，而这些也都成为腐败加剧的客观原因。

就以军队的情形予以说明，当时军队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级军官的薪水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饷费就更少。国军高级将领五十四军军长黄维就曾对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大叹苦经：“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做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混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点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做好不好，做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

蒋介石对于官场中的这种腐败现象并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责政府中“做官不贪赃、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到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为此他曾多次下令严惩贪腐行为。然而这种处罚往往是随意性的冲动，远非制度化的举措，而且惩治的对象大都只是那些较低级的官员，这里我们可

以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后，为了缓和物资紧缺的问题，特别设立平价购销处，并委任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兼任处长。尽管章元善上任后也颁布了一些法令，企图实施“以量控价”的政策来抑制物价，然而没有物资为基础，那些空文如何制止得了物价的上升。章元善无奈之余，只好辞去平价处处长一职。此时大后方的物价已如脱缰之马，老百姓更是怨声载道，政府各部门之间也相互推诿。为了堵塞民怨，蒋介石决定“借人头，平物价”，1940年12月28日，他指示戴笠等军统人员将章元善和国货联营公司经理寿墨卿秘密扣押。然而调查了大半个月，并没有查到章元善等人的贪污证据，加上经济部翁文灏部长的力保，只能释放他们。但是为了面子，最终还是以“玩忽政令，贻误事机”的莫须有罪名，免去章元善的所有职务。

另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则是成都市长杨全宇的囤积居奇案。当时大后方物价飞涨、物资紧缺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粮食供应的短缺更加牵动市民的神经。1940年3月13日，成都市发生抢米风波，作为一市之长的杨全宇自然负有一定责任，其后又传出有人以他的名义购进300石大米的消息，尽管他本人事先可能并不知情，但此事一经披露，立即引起成都市民的愤怒和舆论的抨击。正为粮食问题感到焦头烂额的蒋介石闻讯后极为愤怒，并下令从严惩治。于是，杨全宇先是被逮捕，免去所有职务，接着便移送军法总监部审理。军法总监何成濬以为杨囤积粮食数额

未超过 1000 石，尚未达到死刑标准，对他拟判处有期徒刑，但蒋介石为了制止物价上升，决定杀一儆百，最终下令将杨全宇以囤积粮食之罪名处以极刑。

当时任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看到报纸上刊载杨全宇被枪毙的消息不禁大吃一惊，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道：“吃午饭时看报，朋友杨全宇被枪毙的消息突然射进眼帘。囤积居奇以至处死这是第一个，他是才卸任的成都市长，大川银行的总经理，官不大不小，地位不高不低，这时候恰好做一个牺牲品。他囤的麦子虽不过 300 石，处死的作用却是不小的。”陈克文的说法倒是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对此蒋介石也很清楚，这就是乱世用重典，他在 1940 年 12 月 28 日“本星期反省录”中写道：“杨全宇于 23 日伏法后，人心为之一快，物价已趋平稳。”而在三天后的“本月反省录”中他又重申：“石友三通敌谋叛，杨全宇囤积居奇，两人先后正法，关于军事与经济前途之影响甚大。”

关于政府在反腐肃贪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弊病，《华西日报》在 1944 年 5 月 16 日的一篇社论中就曾评论道：“至于县市以上，官愈大势愈厚，而贪污数目愈为警〔惊〕人者，无有。这是不是说大官尽廉、小官才贪呢？不是。政治上从没有大官真廉而小官敢贪污者。真贪污而无人告发检举。吞舟之鱼漏网，而落网者皆鼠窃狗偷之徒。大奸大恶，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所以由此产生的下级贪污，也就诛不胜诛、愈来愈多了。”

这倒也不是说，蒋介石对于高层官员的贪腐行为完全不闻不

问，他在日记中就经常痛斥属下、包括一些高级官员贪腐的行径。1942年，林世良以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的地位和名义，勾结大成商行章德武从仰光将3000万元物资运往昆明，转手就图利1000万元。此案为军统人员所破获，社会为之震动。但是林世良与孔公馆的关系实在太深，他常替孔夫人与孔二小姐做生意，众人皆知，因此孔祥熙竭力为其缓颊，军法执行总监部判处他无期徒刑。此案传到侍从室后，引起唐纵、陈芷町等人的不满，认为执法不公，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重判。当天蒋介石就亲自下令，林世良判处死刑，不许缓刑，并限第二天执行公布。蒋介石在12月26日的“本星期反省录”写道：“林世良与许性初案，依法严惩，此实为以后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最大之关键。”

另一个案件则直接牵涉到孔祥熙。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接到有关孔祥熙涉嫌卷入美金公债舞弊一案的报告后，即多次下令财政部予以认真调查。当财政部将确凿证据提交在他面前时，蒋介石极为愤怒，他在日记中说：“审阅中央银行舞弊案全文，为之痛愤不已。”为此他曾亲自召见刚刚回国的孔祥熙，“告以此案调查经过与事实及人证物证，属其好自为之”。然而孔祥熙“总不肯全部承认也，可叹！”甚至蒋介石“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彼始犹指誓强辩，令人痛心，殊愧为基督徒矣”；“彼总想口辩掩饰此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蒋介石虽然经常在日记中责骂属下，但用“可

耻之至”这样的言辞辱骂孔祥熙还是第一次，可见蒋此时的确是对孔痛愤已极。

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孔祥熙予以痛斥，但并没有公开道破，还是让他“设法自全”，算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然而在人证物证面前，孔祥熙还想抵赖，这时蒋介石愤怒至极，“更觉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痛愤极矣”。他曾一度决定将此案公开，由监察院和国民参政会进行彻底调查。他的亲信闻讯后立即加以阻止，说此案若要深入调查，势必破坏国家的形象，失去国际的援助。最终蒋介石决定，将此案“仰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只是“庸之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这桩震惊中外的贪腐大案，最终就这样不了了之、仓促结案了。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从信任有加到暗中调查，从愤怒至极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时他的矛盾心理。尽管蒋介石可能曾一度有大义灭亲的想法，但是一旦党国利益与家族情谊纠缠在一起，他也完全无能为力了，这就像他在给宋子文的一封电报中所说，所有举措必须“增加我内亲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测”。

虽然此案在强权控制之下得以一时遮掩，党国与家族的声誉亦暂时得以保全，但这种后果却极大地助长了贪腐行为的扩张。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大员“五子登科”，军政官僚贪赃枉法，豪门资本以权谋私，贪污与腐败已逐渐成为体制性的行为，就像恶性癌细胞一样，迅速蔓延到肌体的每一部分。战后接收不